

· 云南省博物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 编印 ·

· 1985 ·

①

7087

民族考古译文集

目 录

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发展…………… (1)

(日) 量博满

中国南方——西江流域和红河上游盆地的陶器
…………… (21)

(港) 何翠媚

中国青铜器上的织物伪形…………… (36)

(美) John Vollmer

中国中部、南部地区伤残牙齿的习俗…………… (44)

(日) 江上波夫

华南种族的构成…………… (51)

(日) 白鸟芳郎

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流

——石寨山遗址与奥开奥遗址…………… (76)

(日) 冈崎敬

云南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 (93)

(日) 森本和男

滇西的剑…………… (100)

(日) 今村启尔

- 日本民族的形成…………… (107)
(日) 江上波夫
- 欧亚大陆的剥头皮习俗
——兼谈斯基泰人的起源问题…………… (117)
(日) 江上波夫
- 东南亚的骑马人和马具
——马镫的出现小考…………… (126)
(日) 新田荣治
- 后印度铜鼓向东印度群岛的播迁…………… (134)
(德) A.B. 迈尔
- 泰国东北部遗址之断代与时期…………… (155)
(美) W.G. Solheim
- 泰国翁巴洞穴及其出土的第五面铜鼓…………… (165)
(丹) 佩尔·索伦森
- 缅甸巴登林洞穴的“新石器”文化…………… (184)
(缅) 乌·阿乌讷格·萨乌
- 历时一万年的家…………… (201)
(澳) Peter Bellwood
(马来) Adi bin Haji Taha
- 越南铜鼓上的花纹…………… (210)
(越) 武世龙、郑高奖、黎文兰
- 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 (225)
(法) V. 戈兹波

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发展

(日) 量博满

由于解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引人注目的发展，今天已经可以描绘出并非传说的客观的古代史，这一事实已无须赘言了。其间，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随着日积月累的资料的增加，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研究范围都有扩大，从点乃至线的片断知识到对整个面的理解，再进一步对立体的乃至结构的认识已成为可能，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今后如何看待在客观上，以及内容上更加复杂的研究领域，如何试如以整理，并非容易之事。如果要归纳今天的调查和研究成果的话，那么有最近出版的《文物工作三十年》^①，有夏鼐^②，安志敏及苏秉琦^③、殷玮璋^④等的论文，缺少这些优秀之作那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回顾研究情况，作为研究结果。作为理解现状的一种方法，当获得新资料时，如何理解它，在全部构图中把它置于什么位置？这就是本文叙述的焦点，也就是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时期范围及其变迁。这一点，关系到文化发达的理论，这不仅是中國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能在人类史上有关文化发达的一般规律的形成上做出某些贡献，再有，在中国国内，经过这个时代，形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的夏商文明是如何出现的，也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有

很密切的关系。

一、摇 篮 时 期

我们可以把新石器时代研究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

第一期：1920年至1949年，属摇篮时期

第二期：解放至1960年，属发展时期

第三期：1972年以后，属转变时期

所谓第一期是中国开始进行学术性的发掘调查，确认在黄河流域存在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期，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被认识，加上殷墟调查，三大文化的存在及其时间关系的轮廓被描绘出来的时期，也是新石器文化的二、三百个遗址被确认，实际上只发掘了一小部分，对远离黄河流域的称之为古文化的华北北方新石器文化和东南沿海几何印文陶文化仅仅有粗浅的了解，而其实体几乎还未搞清楚的时期，也可以说是研究的摇篮时期。所谓第二期，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的这段时期。在此期间，随着遗址发现的急增，除了黄河流域外的其它各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各种各样的文化在各地出现，而且，一种文化有多种的类型，研究上，开始从面上发展到对结构的认识，所以也称为研究史上的发展时期。这种繁荣的趋势直至今日还在发展。但是，特别要划分第三期的意图在于，隔着文化大革命，1972年再次公布了调查和研究成果，同时，在考古学的编年上，开始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来测定年代，以物理化学方法来决定年代也开始被中国考古学采用；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受到六十年代前构筑起来的研究框框的决定性影响，要把握或认识各种文化，不得不采取新的对应措施。碳十四革命，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史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对起源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得不修改文明史。

同时，关于古代文明发展的新理论也在摸索中。所以，把第三期说成是研究的转变时期。把这种研究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看起来也许是以政治变动为基础，但是所区分的各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在学术上有着显著的质的变化和差异。根据这种划分，下面打算概述各时期的研究情况。

第一期，特别是从二十年代到解放的这段时期中，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大概在日中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前，此后直到迎来解放的十多年间。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状况相同，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也处于停滞阶段。因此，该时期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前半期。其主要的成果不用说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现，其中又集中在对这两种文化间的关系以及来源的研究。

仰韶文化的研究，是从1921年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调查开始的。以后知道以彩陶作为代表性文化指标的这种文化，分布在从甘肃、青海一带到山西、陕西、河南的中国西半部地区。另一方面，以黑陶作为代表要素的龙山文化，1928年由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发现其遗迹。1930年，1931年的调查^⑤，成为认识龙山文化的起点。以后，在河南、山东、安徽、浙江、辽东半岛等地，三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的东半部，或者从渤海湾到杭州湾及东部海岸地区陆续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遗迹。这样，从学术调查开始，仅十多年中，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东西两大新石器文化的存在得到了确认。关于对各种文化的了解，下面将要谈到。

关于仰韶文化包括了彩陶文化这可以理解，而仰韶文化内有几种地方类型则还未搞清。安特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单色陶器比彩色陶器出现的早，并考察了仰韶村遗址，提出把甘肃的彩陶遗迹作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向铜器时代过渡的过渡时期，而这段过渡时期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三期，再

加上作为青铜器时代开头的三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共六期的主张^⑥。再有,他对彩陶的理解,注意了出土陶器和墓地陶器的区别。然而从学术上来看,比其它更重要的认识是他认为彩陶文化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我们的研究当然不能停留在个别地域上,如果我们的研究放在探寻超越地域的整个人类史的一般规律上的话,那么安特生试图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放在世界史的地位加以研究的意图,自然是一大功绩应该给以好评。但是,他的理论是否妥当先不说,在人类史上先进的西亚及其文化传播这样一种在今天都还受到许多研究者极力支持的西亚中心主义和西亚文化传播论,或者说西亚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则是务必搞清楚的。所以,中国解放后的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对安特生的纪年和传播论的反击,这也是需要记住的。对于安特生的纪年的疑问,早在解放前夕即1947年刘耀(尹达)就提出来了^⑦。1948年,夏鼐提出甘肃的仰韶文化比齐家文化早这一决定性的论点^⑧,安特生的纪年论崩溃了。

与仰韶文化相对照的是,龙山文化的研究完全由中国研究人员担当。第一研究期虽然搞清了龙山文化,然而这也仍是基于对黑陶文化的概括性理解的基础上。该文化分布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而且与仰韶文化的对应年代是,在河南北部比仰韶文化晚,比殷墟文化早,这已得到确认。所谓黑陶文化是指对龙山文化的地域的多样性不了解,把黑陶作为重要的文化要素,包括它在内的广义文化。但是,正式公布是在解放后的1954年,而所依据的资料仍是解放前的。梁思永据此描述了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时指出由于文化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按地区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杭州湾三个部分^⑨。这是在此研究期出现的一个成果。实际上,关于这一文化的地域

差别，解放后已经进行过详细的研究，龙山文化的很大一个问题是地域的多样性，这已得到确认。另一方面，尹达从时间性来认识地域的差异，编排了龙山文化的年表，把龙山文化分成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三个时期，认为就陶器的形态变化来看，随着从两城期向辛村期的推移，逐渐接近小屯文化的特征，龙山文化的继承者是小屯文化^⑩。并且，他以龙山文化的编年为基础，引出了重要的论点，即从地理来看，早期的两城镇遗址在沿海的日照县，晚期的辛村遗址在河南北部的濮县，因此可以说龙山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由东向西。

关于龙山文化发展的动向，与尹达的见解相同，梁思永也认为以黄河上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有东渐趋势，以黄河下游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有西渐趋势^⑪。根据有代表性的两位研究者的理解，如果要描绘第一研究时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图象的话，我们就可以整理出说明两大文化论和两者的接触这样一种混合文化说的范围。西边的仰韶、东边的龙山作为完全不同的文化而相并存在。龙山镇遗址发掘不久，就发现了河南北部的后岗^⑫，以及侯家庄高井台子、大赆店、刘庄、同乐寨等遗址。仰韶文化在下层，龙山文化在上层，这种层序关系也得到确认。然而，这种状况被解释为两种文化分别到达两种文化界的边缘时间差，而并未表明两种文化在时间上的前后关系。此外，就象我们所看到的河南西部的各种遗址（例如安特生调查的仰韶村遗址等）那样，在同一层中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物同时并存，这被解释为两种文化同时接触的混合文化。总之，该时期对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是在两大文化范围内进行的。正好两大文化论既是与傅斯年的夏夷东西说相对应的见解，又是作为贝塚茂树等的殷人东夷说的一个论据。然而，把两大文化作为混合文化的认识，不久就动摇了，就是，在该研究末期，石璋如

提出加上彩陶和黑陶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即灰陶文化，并把它置于混合文化的位置^④。但根据对河南西部的龙山要素与仰韶要素性质的再研究，以及从文化根源来看是一种新的年代的再研究，以及从文化根源来看是一种新的年代的再研究，这是与过去的两大文化论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使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此外，在两大文化说中，关于仰韶文化的起源，如前所述虽有安特生等人的西来说，但对于此后发现的龙山文化，由于管见有限，并不知道中国研究人员的看法。然而，卡普兰^⑤主张黑陶是从伊朗西北传来的这样一种西亚传播论，以后被冯·戴尔·奥斯汀^⑥、海涅·盖登^⑦等反复描述。中国对此主张进行了反驳，但比驳斥安特生的彩陶说平静得多，是以龙山文化的研究进展来说话的。

总之，如果抓住新石器时代研究第一期的重点的话，那就可以举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亚文化的东渐、两大文化、混合文化等。

二、发 展 时 期

第二研究期是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间，这个时期中国考古学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考古学可以对从前的历史作出与前代无法比较的详细描绘，对先秦史也可以根据考古学的资料作出历史叙述，至少可以说没有这种考古资料，要复原先秦史是不可能的。从中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飞速发展。

集该时期最初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成果大成的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⑧。该著作中关于新石器时代集中在原始社会一章，首先最显眼的是说新石器文化分为六个地区。就是说，

在全国已发现三十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单局限于黄河流域,而是波及全国,故所以可以理解具有各种特点的多种文化。随着基本资料的增多,解放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又产生了新的认识。

解放后对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有三个主要点。第一,关于仰韶文化的起源,对西来说持反对意见。第二,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时间性、源流的关系有新见解。第三,注意研究各地发现的各种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相互关系。第一个问题,在对安特生的激烈反驳中,从学问上来说达到了连别的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都不听的程度,然而反驳的根据还是有的。首先,安特生的纪年因夏鼐的研究结果被加以订正而崩溃,这在前面已说过。其次,对所发现的彩陶文化的认识深化了。西安半坡村遗址^⑧, 陕县的庙底沟遗址^⑨, 宝鸡的北首岭遗址^⑩等所谓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的实体,说明有不同的类型。而且由于搞清了各种类型的分布和年代关系,就可以明确仰韶文化有甘肃仰韶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两大类。此外,在甘肃的临洮^⑪等渭水上游地区,还发现了甘肃仰韶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在层位上有上下关系。前者比后者出现的晚,而且后者对前者有影响。这就确认,到后来,处于中原仰韶文化后半时期的庙底沟类型与相当于甘肃仰韶文化早期的马家窑类型有密切的关系^⑫,或者说经过各种碳十四年代测定而得到了印证^⑬。这一系列发现说明仰韶时期的中原和甘肃的关系,不是前代所认为的仰韶文化发展的方向是由西向东,而是由东向西。然而,中国西部的仰韶文化比东部的仰韶文化的年代新,这一点对仰韶文化起源于西亚而东渐的观点是不利的。因为根据西来说,仰韶文化当然是在中国西部,而且比东部早,这样,安特生的主张就被否定了,而代之以仰韶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结论。

第二个动向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进展是彻底推翻了前个研究时期的研究结构。象佟柱臣^④那样，仍然把两大文化论作为立足点的研究者虽然也还有，但对那种混合文化的研究，完全向意外的方向展开了。最初引发这种研究的是1949年发展的关野雄的论文^⑤。在该文中，他分析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等的层序关系和黑陶的性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黑陶的发生地在山西南部地区，是从彩陶系列中产生出来的，而且黑陶向东发展，山东的黑陶文化是该文化中最新的。过去认为龙山文化是与仰韶文化不同的别的系统的文化，作为其标志的黑陶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由东向西。所以，在混合文化地区所看到的黑陶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中的最新阶段。关野进行的是哥伯尼式的转变，认为仰韶与龙山是有继承关系的前后系列文化，对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理解，从过去的二元化转为单元化。这种大胆的假设，不久似乎被中国实际的发掘调查证实了。1959年正式刊登的河南陕县的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遗址的报告就是证明^⑥。

根据这个调查，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这样一种具有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特点的龙山最早期的文化被发现了，从仰韶到龙山的继承乃至转移的关系也明确了。再有，受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影响的后岗第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在解放后对龙山文化的研究中，如同梁思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共同性，又有不同点，而总括起来都称为龙山文化，在冠以地名的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典型的龙山文化）等各种称呼的龙山文化中^⑦，河南龙山文化继承了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发现，是解放后中国考古学界取得的最大成果。由于这一发现，研究者们才开始逐渐建立了从仰韶到龙山这种相承续的观点。安志敏认为河南、陕西、

山西的龙山文化源于同一地区的仰韶文化^②，许顺湛认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不但是并行的文化，而且是相同系列上的前后文化^③。不久，在《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说，中原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已成了考古学界的一致意见^④。然而，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发现，使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李济指出^⑤，根据这一点，从二元论到一元论，仰韶到龙山成了固定不变的说法，也即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并不是从第一期文化（仰韶文化）的固有的内容而发展的，而是受外界的影响乃至传播而形成的。而且，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即便表明是龙山文化的某一阶段，也不能说它完全代表了龙山文化的最早阶段，这种看法，今天完全被忽视了，但是今后必须加以注意。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应该说是一个教训。

第三个动向是各地所发现的各种文化。这些文化具有不同于黄河流域的固有的某种特点，应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虽然许多研究者主张这种文化的固有性，却几乎没有对其来源作出说明。根据调查，由于各种文化的时间上的深度不准确，或者虽然明确了年代，但那也是来自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相对的年代关系，而且常常比黄河流域晚一步或更多，对于各种文化的起源没有能接触到。代替起源问题的研究，除了华南地区存在的比较少的孤立的文化外，对文化间的影响、交流等方面进行分析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个时候所接触的，既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又是龙山文化，这是因为黄河流域的研究具有先进性，也许理所当然如此了。

关于各种文化的起源，外国的研究者张光直实际上已经作了明确的解释^⑥。在此之前，他围绕混合文化，提出了“龙山式”的概念^⑦，在此基础上按照仰韶→龙山式→龙山的时

间排列，抓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加上新发现的各种文化，例如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大汶口、青莲岗、屈家岭等文化，然后是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的有彩陶的各种文化，作为龙山式文化全部加以囊括。加之，把这个时间排列作为各种文化的出现或起源来理解，所有的龙山式文化，是以中原的仰韶文化作为基础的，各地区的龙山文化都看作是来源于龙山式文化。换句话说，张光直认为，中国的新石器诸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在由黄河中游的核心地带而来的文化传播领域中统一进行的。虽然还不知道象张光直那样鲜明的，断定是一元论——文化传播论而系统展开研究的国内研究人员，但相似的看法还是有的。各地区的当地研究人员对于周围的各种文化，由于上述原因，不能积极地说明其来源，停留在对尽可能多的所知的黄河流域的仰韶和龙山文化的比较和对照上。对此，作为中央研究人员的夏鼐^③和安志敏^④等说到了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摇篮地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先进性与周围各种文化在时间上的落后性结构中的“影响”。当然，作为影响应该是既有单方面的又有相互之间的，然而他们并未提到相互影响。苏秉琦^⑤认为，如果说仰韶的前半期是向中原地区传播发展为主，那么后半期则是东方的大汶口各种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给予中原的仰韶文化很大影响。这种看法从这一时期的潮流来看是出人意料的。

以上，回顾了解放后的研究动向，试图整理说明研究的显著发展和新建立的结构情况，在这里作为文化论感到有一个奇妙的问题需要指出来，也即关于文化起源问题。中国研究人员主张仰韶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西亚就可能出现另一种独自的文化，人类史上文明的出现也是多元化的。但是，却有一种倾向表明对外是多元论，而对内则一变而为文化传播论。文化传播论从理论上来说，发这文化论与文化核心论

是表里一致的，这导致了文化起源的一元化，至少也是处于多元论的对立点。在国外和国内分别使用多元论和传播论，从逻辑上来说或者从理论上来说都是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要么放弃作为仰韶文化起源问题的多元论主张，要么放弃中原世界核心论。如果放弃前者，那么就否定了解放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这也许将会危及考古学这门学问的存在。要是这样的话，为了保持逻辑的连续性，只能取后者。从中原成为三代的舞台来看，在中国史中常常在政治上、文化上起着中心作用，这是事实，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它在史前时代就一定是先进地区。这种保证只应该由史前时代的场所来证明。正是新石器时代在中原的位置，成了下一个研究期的大课题。

另外，多元论和传播论与另一个文化史上的重要命题有关，这就是文化现象上的类似性。甲乙两种文化中有一些共同现象，是否表明在历史上甲乙间就有关系呢？安特生等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与阿南和托利普利埃遗址的彩陶十分相似，尽管前后两者的距离遥远，仍有历史联系，否定这一点，相似的文化现象就会多元化的兴起。但是，张光直认为，最基本的是，国内的研究人员无形中在中国各地发现了彩陶，而它们与中原的仰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似乎具有中原文化传播的背景。类似的现象，由于距离远就没有关系，距离近就有历史联系，这是不应该由空间上的远近来左右的。马承源认为在相同的历史条件、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同的社会经济及地理环境下，产生相同或类似的文化^⑩，这是极为有意义的理论，然而在这种理论前，是不应该允许有个别的特殊情况的。当对外的理论对内也有效时，才是接近正确的理论。

关于多元论还是传播论的问题，不是仅仅由桌面上的想法所能解决的。当然必须依靠实证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

线索，仍然是搞清文化年代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下一个研究期的意义确实重大。

最后，如果要举出该研究期的重点的话，有中原仰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自生、庙底沟第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的各种类型，周国的各种文化、多元论、传播论、相似性等。

三、转变时期

从1972年起开始了转变时期，在此之前作为第三个研究期的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考古学的调查及成果完全没有发表。虽然考古学的活动是完全不应该停止的^③，却明显的停滞了。1972年初，随着刊物的重新开始出版，我们看到了如江河奔流似的新资料。但是却没有用洪水奔流似的研究热情来制定研究计划。作为考古学新纪元的理由是开始用碳14来测定考古资料，不管如何强调它的意义也不会过份，因为这是研究史上的一场革命。测定的结果（现在也逐渐公布了）一开始公布，很多研究就受到其影响。其中，可以说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受到最深刻的影响。

国内外的研究者们，迅速品味着这些资料所起的作用^④，不久，解放后构筑起来的研究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已经公布过的考古资料也好，在陆续出土的新资料也好，都运用了年代测定法，在此基础上夏鼐整理出了下述一些文化的年代^⑤，即黄河中游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相当于公元前7,000年至6,000年前半时期，仰韶文化大体是在公元前4,800年至3,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至2,300年。此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大约是在公元前5,000年至4,750年，马家浜文化大约是在公元前4,750年至3,700年，良渚文化约是在公元前3,300年至2,250年。磁山、裴李岗文化，如后所述，是近年发现的

前仰韶文化的一种，先暂不研究它，这里所举的年代说明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先进文化与享有粟栽培文化荣誉的仰韶文化确实是在同一个时期，而它们与长江下游的完全不同质的所谓水稻栽培文化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是相并存在的。所以，这种文化的存在表明，过去被称为龙山文化亚种的良渚文化，其实是同一地区的先进文化的下代。这一并存和继承的事实意味着在逻辑上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是多元化的，而且这些文化在各个不同地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于是，这样一来，过去的单元起源论和传播论的结构就动摇了。苏秉琦、殷玮璋认为，到现在为止，发现了六千多个新石器时代遗迹，可以把它们分为十多种文化或类型^⑩。当然，因其中也有继承关系，其源流也更加集中。但不管怎么说，各种不同的众多的新石器文化是并存的，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原地区是唯一的核。所以，把核心地作为前提的传播论当然也是难以成立的。传播论是把起源上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结构作为前提用来替换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而把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和相互作用作为研究的新结构，这已经成了今天研究者的共同认识^⑪。连张光直也放弃了过去所认为的一元论和传播论，大力强调多元论和相互作用^⑫。

在承认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统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就目前状况来说，当然这还是很困难的。集解放后三十年考古学成果的《文物工作三十年》一书就反映了这种状况。编辑的意图何在不清楚，但就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情况来看可以推测书中不得不采用这样的体例，书中把各省市的研究成果按通史方法来排列，读者即使通读全书也无法理解考古学所描绘的古代史，只能当作索引来使用（作为资料归纳的意图也不明显）。我大胆地推测，不得不

采取这种编辑方式，而且不能象《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那样进行编辑的最大原因是对新石器时代的复杂性难以把握。但是，这种复杂性与无意义的混乱是不同的。

由于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考古学建立起来的结构，象建筑物受到猛的一击，分出一些破片一样，研究状况也受到了震动，过去考古学所持的主观的前提也被打破了。这一打破，使那些破片离开了本来就不应该被嵌在的位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说从中原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各种文化，有了自主性，可自作主张了。但是，虽然相互自由了，而如何从混沌的现状向前发展，应该如思推进研究呢？考古学如果没有受到碳14年代测定法的影响，而为了要达到目的，只有仍然把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基于其固有的方法论进行研究。据此，当前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发展方向，暂不谈理论，我认为应该是即物的地域研究^④。刚才已谈到，应该重视与多样性相对的相互作用，当然，为此慎密的地域研究是前提，没有它来谈相互作用，就会因基础虚弱而告终。通过对地域的个别研究，认真分析文化特征上的共同点和差异，文化变化上的导质和传统，才有可能开始研究相互作用。缺乏向外看的地域研究如果发展下去，就会象我国的绳文文化研究那样，由于地域和时代不同，连研究者之间都没有共同语言，使研究陷于孤立而不能自拔。现在新石器文化研究还能这样吗？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地方时代这样一个时期，考古学的地域研究倾向，随着碳14资料的增加而逐渐加强了。这个时候苏秉琦、殷玮璋重新新提出地域研究的意见，确实十分适宜，可以认为是阐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文革后的这一段时期，个别的考古学上的知识明显增多了。例如，中原仰韶文化的类型的区别及其编年，中原仰韶文化和甘肃仰韶文化的接合点问题，甘肃的齐家文化的特点，龙